

# 别求新声

第二版



汪晖访谈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别求新声

汪晖访谈录

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 / 汪晖 著 . — 2 版 .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ISBN 978-7-301-16904-9

I. 别… II. 汪… III. ①访问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I267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0495 号

**书 名：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

著作责任者：汪 晖 著

责任编辑：丁 超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904-9/G·281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pw@pup.pku.edu.cn](mailto:pw@pup.pku.edu.cn)

封面设计：高海云

版面设计：点石坊

印 制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mm×1020mm 16 开本 31 印张 45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2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自序 /001

## 一、思想分野

1. 新批判精神 /004  
——答《新左翼评论》杂志问
2. 理论、实践与历史诠释 /037  
——答纽约大学东亚系研究生问
3. 历史的可能性——想象与实践 /068  
——答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问
4. “中国制造”与另类的现代性 /105  
——答《装饰》杂志问

## 二、世界图景

1. 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120  
——与佩里·安德森教授的对话
2. 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反思全球化 /139  
——与柄谷行人教授的对话
3. 去政治化的日本政治及修辞 /155  
——与小森阳一教授的对话
4. 美国自由的故事 /170  
——与艾瑞克·方纳教授和王希教授的对话
5. 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 /185  
——与李欧梵教授的对话

### 三、历史诠释

1. 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 /200  
——答《21世纪经济报道》问
2. 什么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 /232  
——与沟口雄三教授的对话
3. “谁”的思想史? /238  
——与艾尔曼教授的对话

### 四、现代性反思

1. 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 /252  
——答《书城》杂志问
2. 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反思 /266  
——答《中国图书评论》杂志问
3. 鲁迅：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人物 /275  
——答《南风窗》杂志问

### 五、艺术问题

1. 爆破的仪式 /286  
——与蔡国强先生的对话
2. 艺术中的政治：中国当代艺术的西迁与回归 /294  
——与朱金石先生的对话
3. 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困境 /310  
——与潘公凯教授的对话

## 六、杂志及社会

1.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去政治化的政治” /336  
——复旦大学许燕的访谈
2. 创造独立思考的思想空间——《读书》杂志与中国思想十年 /371  
——答《21世纪经济报道》文韬问
3. 用杂志走入问题和人群的中心 /382  
——新加坡《圆切线》杂志的访谈
4. 坚守思想空间 /400  
——《北京青年报》刘净植的访谈
5. 《读书》事件的前前后后 /410  
——《南都周刊》甘丹的访谈
6. 我们这个世界不应反思吗？ /422  
——《南方人物周刊》徐梅的访谈
7. 现代化本身需要被反思 /432  
——《经济观察报》马国川的访谈
8. “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 /439  
——《南方周末》夏榆的访谈

## 七、学术背景

- 在历史中思考 /450  
——张曦、阳敏的访谈

- 跋 /481  
再版后记 /487

# 自序

“别求新声”一语源自《摩罗诗力说》中的一句话，即“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但我所谓“别求新声”未必都在“异邦”。如鲁迅所说，“新声之别，不可究详”，在“异邦”发现的“摩罗诗派”也只是“新声”之一端。<sup>①</sup>近日偶然重读鲁迅这篇作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文字，觉得他在篇首所引尼采的一句话与我的想法庶几相近，不妨引作标题中“新声”一词的注释：

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泉。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sup>②</sup>

这句话是对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第五十六节第二十五段第一、二句的翻译，与其他的现代汉译相比，似乎更为精当。<sup>③</sup>“方来之泉”或“新泉”是通过“古源”的探求奔涌而出，但探求的方向却是全新的。这是长久的、对自己之为自己的追寻，而不是重复“古源”——那不过是在堂皇名义下的没落而已。鲁迅说：尼采“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惟文化已止之古民不然：发展即央，隳败随起，况久席古宗祖之光荣，尝首出周围之下国，暮气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sup>④</sup>日新月异的中国，似与一百年前截然不同，将我们说成是“文化已止之古民”自然有些失敬，但我们的文化创造力比之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鲁迅又如何？一百年过去，鲁迅对于探寻古源、别求新声以打破喧闹之

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63页。

③ 楚图南译本的翻译为：“在古代的种族中生长起来的智人，看哪，最后他寻求着未来之泉水，寻觅着新的种族了。哦，我的兄弟们呀，不久新的种族会起来，新的泉水奔注到深渊。”（《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265页。）译者将新的人民（复数）直接译为“种族”，反而弱化了“源泉”在这段话中的意义。

④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4页。

中的寂寞的呼声，仍在我的心头回荡。

自进化论入中国，求“新”几成思维定势，但鲁迅所谓“新声”有所不同。不但这“新声”从“古源”奔流而来，而且也是真正的“心声”。“盖人文之留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sup>①</sup>鲁迅对于“新泉”、“新生”、“新力”的论述，全部归结于对打破“寂寞为政”之“心声”的探求。在“追新逐异”的逻辑下，我们所见所闻无非将重复他人之旧习惯、旧道理、旧知识、旧规则作为“新事物”而已，“新”不过是“无自性”的另一种说法。“别求新声”之“别”首先意味着将对“新声”的探求从时间的轴线上解放出来，构筑“新声”与“心声”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新声”之“新”并非时间性的形容词，毋宁是对由内向外展开的态势的描述，鲁迅把这样的“心声”或“新声”称为“自觉之声”。他说：

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非然者，口舌一结，众语俱沦，沉默之来，倍于前此。盖魂意方梦，何能有言？即震于外缘，强自扬厉，不惟不大，徒增歉耳。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sup>②</sup>

“别求新声”不是“震于外缘”的行动，而是通过审己、知人和比较而产生自觉的过程。

收录于这本书中的各篇对话形成于1991年至2008年间，其间并无系统连贯的主题，其中若干篇什产生于“异邦”，但中国之“古源”和现实也提供着“别求”的舞台。这舞台一无遮拦，新的、更新的（有时也以更古的形式出现）剧目走马灯似地上演，仍然让人摆脱不了寂寥和空洞之感。通过对话，找寻“自觉之声”，也是这一连串对话得以产生的动力。

2008年4月5日于荷清苑

<sup>①</sup>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65页。





## 一、思想分野

# 新批判精神<sup>①</sup>

——答《新左翼评论》杂志问

时间：1997年秋

地点：美国洛杉矶

**《新左翼评论》**（以下简称“《新左翼》”）：《读书》杂志在中国思想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您是如何认识在《读书》做主编的工作？

**汪晖**（以下简称“汪”）：《读书》最初的一期是1979年4月出版的。开卷第一篇的题目就是“读书无禁区”，可以说这是《读书》自始以来的一贯精神。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基本编辑方针，而且将来也决不会改变。陈翰伯先生是倡议创办《读书》杂志的关键人物，陈原先生是第一任主编，他曾经担任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为重要的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也曾担任国家出版局的局长，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一年后，范用接任。范用是一位进步文化人士，从40年代起就从事出版业，并一直与知识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我以为，在80年代，他是这本杂志最重要的人物，是他使《读书》成为80年代新思想和新论争的关键性场所。他在80年代后期从三联书店总编辑和《读书》杂志主编的位置上退休，沈昌文接任。在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和副主编的人中，史枚、冯亦代、沈昌文、董秀玉等在那个时期也先后担任《读书》杂志的副主编或编辑部主任等职。从创刊至今，我们有四任主编，即陈原、范用、沈昌文以及黄平和我。在我们这一任，董秀玉担任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也成为《读书》的总编辑。著名的漫画家丁聪先生从创刊至今，每周都给《读书》画漫画。

在1979—1984年间，新问题一般都是由老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思想开放的知识型高级干部提出的，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问题。大约在1985年前后，一代年轻知识分子步入了舞台中心。其中就有“文化：中国

---

<sup>①</sup> 本访谈原题为“Fire at the Castle Gate”，原载于 *New Left Review*, No.6 (Nov./Dec.2000): 69-99. 2003年经增补修订后收入 *One China, Many Paths* (edited by Chaohua Wang,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3, pp.55-86)。

与世界”丛书编委会，致力于翻译出版一系列西方现代思想的经典著作。这些书大部分由三联书店出版，沈昌文、董秀玉以及编辑王焱也参与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而《读书》发表了很多关于这些书的书评，在大学生、研究生和活跃的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人们热情接纳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理论和经济思想。尼采、海德格尔、卡西尔、马尔库塞、萨特、弗洛伊德，更不必说现代化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全都迫不及待地在那时的各类文章中露面。当然也不是没有抵触，因为这些介绍性文字经常受到文体晦涩、新名词过多的批评。但总的说，那是一个知识解放的时代，这些问题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困扰。现在看来，当时的年轻一代其实是对翻译介绍新理论、对新知识本身更感兴趣，未必在选择时就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而老一代则与政治——党内政治和国家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这种情况下，《读书》并不是一本政治上激进的杂志，相对来说，它在80年代后期与政治潮流有一定距离。但恰恰是这种距离为进一步讨论创造了思想空间，而这对1989年以后的思想变化而言并非无关紧要。

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年底，很多杂志都经历了重要的编辑人事变动，发生了转向。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权威性刊物《文学评论》随着人事的变化而彻底改换了面目，像我这样的作者再也没有给这个杂志写过文章。《读书》却保持了稳定，沈昌文是当时的主编，他任主编直到1996年。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读书》及其编辑者此前没有直接卷入政治性活动，《读书》也不是一本政论性的刊物。在1989年后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一般氛围中，《读书》以其开放赢得了声望。不用说，压力总是有的，在这本杂志的历史中是常态。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商业化和消费文化大潮席卷了全中国。为适应新的形势，沈昌文对《读书》的编辑方针也做了调整，注重可读性，也发表一些比较轻松的文章。在五六年时间里，发行量有了长足的增长；杂志比以前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但也引来了学术界一些朋友的批评，因为国内学术研究的发展变化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那时《读书》仍然在介绍新思想新理论，像东方主义还有后殖民主义等等，而且仍然被视为精英文化的代表。1994—1995年由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等开始的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由《读书》推动的，这个讨论后来造成广泛的影响，也可以视为90年代思想辩论的重要开端之一。不过，《读书》在90年代初期的变化确实显示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新的紧张。

1996年沈昌文退休，三联总编董秀玉先生请我做主编。我的方针是渐进地对《读书》的风格作一些调整，一是注意反映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新动向，二是发现新人，三是提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争鸣。这年年底我按原定计划去香港做一段时间的研究，因此请来了社会学家黄平与我一起担任执行主编，这个格局延续至今。自那以后，我们在《读书》的编辑方针一直是——在保持可读性风格基础上，力求将方向转向真正的思想讨论，努力将杂志的内容从文学和人文学科为主扩展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以及过去很少涉足过的考古学和地理历史等领域。我们希望在保持这个杂志的一贯风格的基础上，将它改造成为一个能够激发更为广泛的关心和讨论的公共论坛。我们组织了一系列问题的论争和讨论，包括乡村社会以及后来的三农问题、伦理价值、亚洲问题、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自由主义、法律与民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许多话题在当代中国都是首先出现在《读书》的版面上，然后其他报刊才跟进的。尽管我们有自己的取向，但总体而言，我们刊物上发表的观点涵盖各种不同的观点。黄平和我的文章一般发表在别处，以便更好地保证刊物的客观性。我们的作者队伍也有着实质性的扩展，很多新作者都是在为《读书》写作之后建立了社会声誉的。所有这些都使《读书》成为活跃论争的焦点，其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2万至13万册，总体而言则始终保持在10万册左右。在《读书》的历史中，过去的九年也是杂志的发行量最高的时期。

**《新左翼》：**自从2000年以来，互联网似乎已在中国迅速上升为论争的主要媒介。姑且不论其好坏，这一现象为思想交流——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思想交流——带来了什么变化？

**汪：**这确实是近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所有不同的势力如今都能在网络上找到发泄渠道。政府方面加强了网络管理的力度，但并不是很有效。互联网带来了三个主要的好处。首先，它创造了一个能够使大陆和海外的知识分子直接交流的空间，一个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知识分子共享的空间，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区域。其次，网络允许人们就许多与政治直接相关的问题发言，而这些问题在大陆出版的印刷品上一般不涉及。最后，它可以将地方性消息迅速地传遍全国，引起广泛的关注，而这是以前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可以说，网络起到了联系地方性、全国性以及国际性空间的作用。

但网络的局限性也很明显。网络传递的信息并不可能超越各种力量的限制。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可能核实，也就无法确认信息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网络也为不负责任的任意发言提供了理想场所，在匿名写作的保护下鼓励个人攻击和诽谤，而哗众取宠的言论往往成为网络讨论中的中心。与此同时，网络上并不容易展开理论性探讨，因此目前中国的印刷刊物仍然是理论争辩的主要战场。近来印刷刊物也在建立自己的网站，也许可以预期未来这两种传媒之间的互动将会增加。自2000年开始，互联网确实在强化激烈论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围绕当代最为紧迫的各种问题形成新的不同阵营，但网络争论明显地缺乏深度。

**《新左翼》：**从政治领域来看，80年代的中国状况可以很轻易地划分为两个阵营——“改革派”与“保守派”，可以说是本身已经包含价值判断的一对对立概念。在90年代进程中，相关概念起了变化，人们开始谈论自由主义，后来又有“新左派”。是什么带来了这些发展变化？

**汪：**在70年代末，“保守派”指的是坚持毛泽东晚年路线的人，又因为坚持认为必须执行或遵守毛泽东的每一句话而被称为“凡是派”；“改革派”则指的是支持邓小平政策的人。后来，人群站位不断变化。“改革派”和“保守派”这二者之间的分别在老一代党政领导人眼里可能很明了，可是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就模糊得多了。

到了90年代，继续沿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类已经很难与实际相对应了。在某种意义上，1989年之后的经济改革政策比80年代要激进得多，在权力体制内部已经不再有任何反对“改革”的声音了。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也在邓小平推动下推出许多激进的改革措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语汇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起始时间可以追溯到1993年。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视察深圳，在那里发出了全面放开市场以带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指令，股票证券市场开放、房地产市场兴起，大量经济开发区出现在沿海城市周边。经济的转变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带来消费热潮，也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稍后我们就发现90年代的制度性腐败与这一轮经济改革有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邓小平南巡的社会效果震惊了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对这新一轮改革政策的勃勃生机表示了欢迎，可一旦看到日常生活和文化的结构和内容都被“南巡”唤起的商业化大潮席

卷而去，又开始感到某种幻灭。与此同时，市场扩张过程的重要的内容是“非国有化”，而“非国有化”正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通过国有资产改革而形成新的联盟的时期。80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形态既支持开放政策，也支持邓小平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新启蒙”。90年代初的两个论争表明，思想界的参照系正在起变化。1994年夏天，香港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发表了当时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的青年学者崔之元的题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束缚，那么现在应该有第二次思想解放，以摆脱“新启蒙”留下来的一系列假定。崔之元在讨论中汲取了三个方面的思想成果：美国的批判法学研究，西方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新进化论理论。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这篇文章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就在于其以平静的方式讨论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说有多少读者真的明白这个名称的内涵，而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早已被很多知识分子排斥在学术语言以外的词语本身引起了震动。其实他所谈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陆长期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相差很远。崔之元还与美籍巴西裔法学家罗伯托·昂格合作，写作了分析俄罗斯经济改革结果的文章，作为对中国改革者的警告。与此同时，另一位在美国的青年学者甘阳也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文章讨论乡镇企业，认为这是一种既非公有制又非私有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通往现代性的独特道路。所以说，原来的共识最早是由海外青年学人打破的。

在这个时期，另一个重要的辩论正在《读书》上展开，一群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强烈谴责社会生活日益严重的商品化趋势正在毁灭中国的“人文精神”。这一课题最早是由上海知识分子提出的，可以想见，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和消费中心，和北京比起来，那里的知识分子因“南巡”带来的无情的商业化大潮而受到的震动更早也更深刻。倒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对任何形式的市场化都怀有敌意，毋宁说，他们是在感慨中国的市场化没有能达到欧美经验之下的标准。有的人回到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直接关系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的缺陷。他们因此认为，理想的资本主义理当与人文精神相容。这一讨论背后并没有强烈的政治立场——此时他们也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市场化依赖于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在他们眼里，这个政治制度从来没改变过，但根本性的问题似乎只是人文精神的失落。

与此并无联系而且时间上也稍早，《学人》杂志聚集起的学者——包括我

本人在内——已经开始探讨一些尖锐的课题，反思 80 年代的群众运动。我们发现，曾经对民众运动发生过极大影响的“新启蒙”知识分子们事实上对中国历史知之不多。他们没有下气力研究中国现实，而是简单地将西方思想进口到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以为，严肃认真地反思中国现代史，学习了解专家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是当时最根本的任务。原有的研究多半都是传统式的，因此我们也提出了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有关“新左派”的议论，出现了这么一个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立场，同时对叶利钦经验也比“新启蒙”更清醒的派别。在我记忆中，是《北京青年报》的一篇短讯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提法，不过当时没有多少人注意。我自己并没有使用这个标签，而只是强调有必要以批判眼光分析中国现实，也有必要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当代世界的变化。《北京青年报》的文章提到新马克思主义，也谈到“新左派”的观点，基本上还是肯定的。不过，该报的编辑早期有“新权威主义”倾向，他们用“新左派”的概念概括这一思想动向的含义当时并不是很清晰。在中国环境里用这个词，我总觉得有些勉强。不过，这一概念的提出自觉地和不自觉地是要与主流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由派”或“新右派”的观点作出区分。

**《新左翼》：**“自由派”的名称那时已经用得很大了吗？

**汪：**并不是在今天的意义上。大家都知道，在 1986 年曾经有过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就更不必说 1983 年了。不过，那时的“自由主义”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用这个词时的理解并没有多少不同，主要指的还是个人行为方面和缺乏纪律之类的问题。那时的“新启蒙”思潮也并没有以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模式，而是在不同的社会主义类型中寻求启发。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曾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新启蒙》杂志的王元化也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苏绍智则发表过关于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改革的研究成果。至少在当时，他们这代人仍然瞩目于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尽管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自然地与自由主义有亲和性。但就一般而言，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新启蒙”方面活跃的著名知识分子都与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改革派保持了良好关系，他们的主要讨论还是在社会主义的范畴内展开的。这个氛围在 80 年代中期开始变化，80 年代末叶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哈耶克的著作虽然还没有多

少人读过，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弗里德曼受到了政府欢迎，为政府经济政策出谋献策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强调要大规模私有化。

**《新左翼》：**这么说，大多数如今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90年代才开始这样做的？80年代时，没人会公开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1989年以后日益激进的改革措施造就了新的环境，使得“自由主义”有可能用来同时表达对政府的支持和反对，即：支持市场化，反对思想监控和践踏人权。这个政治态度建于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是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自由，而获得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是私有财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是否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汪：**大体上，您可以这么说——但其中还有很多不同层次。例如，上海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在文化的商业化大潮面前就很不满，“人文精神”讨论反映了这种焦虑。另外一些人则忧虑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事实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自我定义直到他们找到其思想对立面以后才全面清晰起来。如上所说，最先造成反响的、对市场化更有保留的观点出现于1993—1994年间。但是“新左派”的标志要到1997—1998年间才流传开。右翼的自由主义者捡起这一标志，依据“左派”与晚期毛泽东之间联系造成的负面效果，暗示“新左派”是要返回“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之前，任何对不顾一切的市场化的批评，常常都会被命名为“保守主义”，像崔之元一开始就曾被冠以“保守主义”之名，我也曾被说成是“后现代主义”。1997年以后就不一样了，被贴上的标准的诋毁性标签就是“新左派”。

**《新左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汪：**这和当时文化环境的变化有关。随着90年代的进程，对中国社会整体发展方向的批评越来越多。甚至在非常正统而保守的经济学内部，也有人开始怀疑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在《读书》杂志上发生了影响很大的有关经济学的论争，其中两个重要的人物是何清涟和张曙光。有一次何清涟气愤地告诉我，她也因为发表这类批判性的文章而被称为“新左派”了。海南省的文学刊物《天涯》于1997年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文章完成其实已经四年了，但那时没人敢发表——文章内容是讨论中国反复多次失败了“现代化”努力，结尾处严肃批评了某些人为中国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答



案。开始的时候，知识界没有任何公开反应，所有的都是私下里对我的个人攻击，各种各样的不利传言不胫而走。虽然有很多人议论。公开反响基本没有，后来《二十一世纪》发表了两三篇大陆学者批评我的文章，这才打破了沉默，若干自由主义者跟上来，在国内特别是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了敌意很强的回应。这种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前不久刚从长达十年的《读书》作者变成这本杂志的主编，我们有几期杂志里的文章是专门为了挑战通俗看法并引起争论而设计的。《读书》发行量随之而上，但也有些人质问我怎么会发这样的东西，其中既有李慎之这样的老一代的党内启蒙派，也有新一代的“自由派”，他们原先与我都有朋友性的关系。但这类内容确实激起很多讨论，吸引了更年轻的读者。同一年我还出版了一本论文自选集，主要讨论中国现代性问题，销量也还不错。在这些新形势下，甘阳和崔之元等终于在大陆得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反响。从思想界变化来说，1997年是个转折点。

**《新左翼》：**1997年以后，知识界在政治上的分化仍然在继续吗？

**汪：**1998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很自然地打击了对世界市场的盲目信心。忽然之间，资本主义似乎不再是对繁荣稳定无条件的保证。自由主义者无形中处于守势。但更糟糕的是1999年，北约轰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这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很多中国自由主义者都十分倾向西方，几乎是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任何行动。结果，当普通老百姓都因为轰炸而激起义愤，学生自发上街游行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忽然发现自己被孤立了。对他们来说，意识到自己正在青年学生当中失去公信力是相当痛苦的。其中一些人将民众突然爆发的愤怒比拟于“义和团暴动”，属于无理性排外情结的发泄；另一些人则指责“新左派”在鼓励原始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这样只会使政府受益。在正式出版物上很少能看到这些内容，但是压制下来的紧张一直在积累，到2000年时终于在公共领域爆发出来，“新左派”忽然成为“自由主义”方面激烈攻击的目标。其实，像我这样的人从来都不愿轻易接受这个对立面给我们贴上的标签，因为一方面我们不愿被如此荒谬地与“文化大革命”连在一起，不希望以“新时期”阶段共产党内部的“老左派”为座标；另一方面，“新左派”是一个从西方传入的说法，有其在欧美条件下特定的一系列内涵，既包括代际特征又包括政治定义。我们的历史语境是中国，不是西方；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样一个从西方舶来、语义极为